



1937年到1947年,中共中央驻扎的延安,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、知识分子,还有归国华侨,人们就如“朝圣”般涌入这里。

而斯诺及夫人海伦、史沫特莱、斯特朗等众多外国记者,也睁大一双蓝色的眼睛,打量并且试图理解这座抗日战火中与众不同的西北小城。

美国记者斯蒂尔在造访延安后,深有感触地说:“真的,我要在延安住上十天,那我一定也将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!”

延安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?目光再次回到70多年前,追述那段红色往事。

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特别报道之九

延安,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

文/片 本报记者 任鹏



延安革命纪念馆

2011年6月7日,中午时分达到32℃,是延安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。

延安四周环山,延河水穿城而过,昔日的宝塔山如今已处于市中心的位置。登上宝塔山上的九层宝塔,可以眺望脚下这座繁忙的现代城市,远处则是包裹着延安的群山和连绵的黄土坡。

而在74年前,远处的群山和黄土坡仍在,脚下的现代化城市,却还是一座破败得有些荒凉的陕北小城。

1937年1月,中共中央入驻延安时,宝塔山下仅有一条并不平坦的土路,一下雨便泥泞难行。只有建于唐代成为延安标志的宝塔,依然矗立于延河、南川河交汇之处,看尽朝代更迭变幻,世间兴衰荣辱。

在这条尘土飞扬的大道上,来来往来的并不仅仅是毛泽东带领的队伍。

走,到延安去

1937年,抗日浪潮高涨的这一年,远在重庆的初三学生李莫愁对旧式教育感到厌倦,主动放弃了升学机会。一天,她在报纸上看到延安学校招生的消息,夜晚兴奋得难以入睡,仿佛听到了遥远的宝塔山传来的“抗日救国”的声音。

1938年春节,地上的鞭炮纸屑还未被清扫干净,李莫愁就与好友相约,集合了九个人,离开父母,奔赴延安。

在离西安50多公里处的一个小地方,他们在共产党开设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三个月。

路途和经历似乎在考验他们的热情。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帮助下,他们步行四天,来到离延安更近的陕北公学分校。几个月后,李莫愁报考鲁迅艺术学院,终于在快飘起雪花的一个初冬傍晚,她在灰黄的土色中,看到了暮色中的宝塔山。

从1935年开始,在红白对峙的中国政局里,出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景象:通往延安的或公开,或隐蔽的大小道路上,几乎每天都有身着各色服装的青年,从各个方向汇聚而来,目的地只有一个:延安。

“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,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,燃烧着希望,走进这城门……”作家何其芳用热情的诗歌描绘延安散发出的迷人魅力。

当时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只有两个办法,除了党组织或个人介绍,便是参加延安各学校的招生考试。

毕业后,很多进步青年成为新生的抗日力量。

延安抗日军政大学、陕北公学、鲁迅艺术学院、中国女子大学等十几所院校,大都面向全国招生,在各地的报刊上刊登招生

简章。并在办事处设立专门的招生点,成立“招生委员会”,负责安排各地青年到延安学习和工作。

来自四面八方的爱国青年“朝圣”般奔赴延安。

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车坐,绝大部分人是徒步前进。

油画家王式廓被编入到一个十几人的队伍中,从西安步行奔赴延安。

这些年轻人,每天天刚亮就上路,天黑下来才会休息,晚上他们可能找不到住所。一路是黄土纵横的沟壑,年轻人身上沾满了黄土,但大家并没有因为劳累感到沮丧,情绪反而越来越高涨。休息的时候,大家扯开嗓子学着唱起了陕北民歌。

走了12天,终于到达了延安。

根据美国学者统计,1938年底,等待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有2万人。三年后,延安已形成约4万人的学者、艺术家和知识青年等知识分子群体。

“来则欢迎,去则欢送,再来再欢迎”

再换一双蓝色的眼睛看延安。

“清晨我在山间漫步,穿过峡谷,一路采摘野花……在这里它们显得漂亮极了。然后,我骑上心爱的‘云南’……一阵风似的驰过峡谷,翻过小山。”不只是埃德加·斯诺的夫人海伦,还有史沫特莱、斯特朗等众多外国记者,也深深被延安吸引了。

那时的延安,就像是埃德加·斯诺初见海伦时,眼前的那一尊美丽的希腊女神像,散发出磁石般的魅力。

“我过着一种从未梦想过的平静而美好的生活。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美国,我都不能过得如此自由自在,如此惬意。”史沫特莱在延安申请加入共产党被拒,却无法减少延安在她心中的美好印象。

延安究竟有什么?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?

上世纪三十年代末,抗战是中国唯一的声音,进步青年的抗战热情在膨胀。

王寄生是一位从菲律宾回国的华侨,为了抗战,他先来到南京,战地服务团的报名处冷清无人。他和同伴仿佛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:管事的人说必须找殷实的商家做担保才能报名。王寄生愤慨转而奔赴延安。

“在南京,什么也没有——只有老官吏,老官僚。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……很多人就这样走掉了。”一位上海青年说。

而延安的态度却正好相反。当时的延安,正在度过一段稳定的生活。暂时没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堵,

又远离日本军队,物质有保障,军队在发展,根据地得到了巩固。

主张建立统一战线的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,影响了他们的政治走向。

一切同情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,一切受驱逐、轻视与虐待的知识分子,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不问过去,都可以到延安,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,获得选举权与被选举权。

这是一个张开的温暖怀抱。革命青年来者不拒,知识分子也一律欢迎,不加限制。“来则欢迎,去则欢送,再来再欢迎。”

生活是艰苦的,精神是快乐的

在战时供给制下,八路军津贴分为五等。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,每月津贴能有10元,是毛泽东等人的两倍。知识分子得到了一种被尊重的满足感。

这个偏居西北的孤立小城,精神的力量正在超越物质的需求。虽然条件艰苦,但“延安的青年,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,并不是来追求色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”。

延安散发出的不同气质,让外国记者也明显感觉到了。

陪都重庆被美联社记者斯坦恩称为“哀怨之城”和“一场噩梦”。从延安飞往重庆犹如“从中国的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”。

当时的国民党政府“正在压制民主,打击进步力量,强化新闻报刊审查制度;政府办事效能低下,官场贪污腐败成风。经济在凋敝,四大家族控制经济命脉。更让人失望的是,抗日的正面战场战线正一步步后退”。

对比的反差,给延安带来强烈的认同感。

来自美国的美军观察组成员也在观察延安,即使他们中最

漫不经心的成员也会注意到,延安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和力量,一种想与敌人交手的愿望。

“政府应当是为其治下的人民谋福利的。像样的待遇、公正的税收、基本民权、丰衣足食,这是把共产党军队和政府真正与人民团结在一起的要素。”

“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欧文、傅立叶时期的原始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公共社会生活,唯以英雄的主旨代替了村落的幽静。”在和毛泽东、朱德等人畅谈后,海伦坚信她找到了一种答案。

事情的发展总是相互的。知识分子们投身“革命熔炉”,同样也给延安带去了一股新风。

在全国各地建立50多个办事机构,与美国政府联络,世界各国记者、作家、知名人士以及众多知识分子的到来,让闭塞的延安了解到更多外面的世界,从而变得更加开放。

延安并不是只有单调的军事行动,政治、文化活动、学术活动穿插在生产劳动中。生活是艰苦的,但精神上是快乐的。

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经常搞音乐会演出。7把自制的小提琴,一架破旧的钢琴和一把大提琴同奏中,美、英、苏国歌。75名男女学生组成的合唱队列队登上舞台,演唱《联合国歌》。有的男高音演员还会唱一曲《蝴蝶夫人》,虽然会和钢琴一样走调。

海伦会教高级领导人跳交际舞,她说共产党人对那种舞蹈的西方风度很有兴趣,没有任何反西方的情绪。

“中国共产党人具有现代思想的男女,也是具有现代生活方式的男女……我在延安同任何一个人接触,从未感到有丝毫困难。”

斯诺夫妇的断言



位于枣园的幸福渠可以浇灌当地1400亩农田。

“这里是乐园。我们才到这里半年,说不上伟大建设,但街衢清洁,植满槐桑;没有乞丐,也没有卖笑的女郎;不见烟馆,找不到赌场;百事乐业,耕者有田;八小时工作,有各种保险。”1937年,《七月的延安》让人看到明朗的希望。

原来,世界还可以是这样的:每个人都是平等的,封建礼教、陋习都被废除,人际关系同志式的平等、互助。

在延安,领袖们的亲近态度让知识分子感到很亲切。经常进出毛泽东窑洞的客人中,一位就是非常有名的非党员作家萧军。

那时,领袖们都衣着朴素,言谈随和,经常前往各学校作报告。除了“毛主席”这个称呼,青年们可以直呼其他中共领导人为“同志”。

萧军是在1938年路经延安的,毛泽东从丁玲那里得知这一消息,很想见见这位知名的作家,便派秘书去招待所看望萧军,转达见面的意思。

“我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,到延安来是路过,住不了几天,毛主席公务很忙,我就不去打搅了!”最初,萧军是这样回绝的。没想到第二天上午,毛泽东亲自去看望萧军。

萧军并没有因为领导人接见而欣喜若狂或者受宠若惊。后来,他到了延安,成为常出入毛泽东窑洞的客人。

塞克和萧军是延安“四怪”中其中的两位。1942年春,毛泽东派李卓然登门邀请塞克到自己的住处谈话,塞克同样拒绝了,理由是:“有人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。”最后,毛泽东吩咐撤去岗哨,塞克这才在邓发的陪同下去见了毛泽东。

一股宽容开放的气息从毛泽东的窑洞里飘出。

在毛泽东起草的“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定”中,可以看到中共开阔的胸怀: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,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……绝对不可文过饰非,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,或曲解善意批评作为攻击,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。

1942年初春,毛泽东“整顿三风”的报告就像一股春风把知识分子吹得活跃起来。

知识分子以文学的形式,向主观主义、教条主义、宗派主义发起批判。范文澜在《矢与的》壁上撰文,号召“以民主之矢,射邪风之的”,引领了一股办壁报的热潮。

抗日大环境下,在很多知识分子心目中,中共的形象正在渐渐反转。

斯诺夫妇在著作中断言,中国人已发展了一种独一无二的、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。